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FTA 签订

苗翠芬, 冯祯祯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文章使用 2000~2021 年中国与 196 个伙伴国的面板数据, 实证评估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 并以“是否缔结 FTA”的样本均值作为“正确分类比率”的临界值, 对中国 FTA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 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 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FTA 的概率越高,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也越大。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中国 FTA 对象国涵盖了亚洲、大洋洲、北美、南美、欧洲以及非洲地区的诸多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该研究为中国开展 FTA 谈判和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外交伙伴关系; 自由贸易协定; 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 FTA 对象国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94 (2024) 07-0037-19

DOI:10.13687/j.cnki.gjjmts.20240703.002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述。作为促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形式, 对外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FTA) 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已签署了 22 个 FTA, 共涉及全球 29 个国家和地区。但相比于美洲和欧洲地区,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 (RTA)^① 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 中国对外签署的 FTA 还比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或亚洲大陆, 需要加强与其他区域的 FTA 谈判。另一方面, 中国在 FTA 中的承诺开放度和条款覆盖度普遍偏低, 对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挑战。如何选择 FTA 对象国以及提高 FTA 承诺开放水平, 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 RTA 日渐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选项。随着 RTA 在全球范围的快速蔓延, 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政治等角度来考察 RTA 的签订或缔结

收稿日期: 2023-11-1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 (2023YQNQD061)

作者简介: 苗翠芬 (1987-), 女,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东亚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贸易与投资等; 冯祯祯 (1995-), 女, 山东济南人,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全球价值链。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文责自负。

动机。在经济动机方面,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参与国的要素禀赋、经济规模、贸易开放等“纯经济”特征 (Baier & Bergstrand, 2004; Baier et al., 2014)。二是 RTA “相互依赖性”或“第三方效应”, 此类文献重在考察两国加入一项 RTA 或缔结新的 RTA 是否受到“第三国”签订 RTA 的影响 (Egger & Larch, 2008; Chen & Joshi, 2010; Baldwin & Jaimovich, 2012; 铁瑛等, 2021)。三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激励, 即由于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的缓慢, 进而引发的区域主义发展浪潮 (Krugman, 1993; Mansfield & Reinhardt, 2003; Bhagwati, 2008)。

在政治动机方面, 一类文献从国内政治因素方面来分析。一国政府是否签署 RTA, 取决于对国内利益集团和普通选民平衡的条件 (Vicard, 2012)。另一类文献从国家间政治关联性来考察, 常见的解释包括“相对权力转移”、民主制度的传播以及对地缘政治稳定的追求。“相对权力转移”假说指出, 当一个区域内的权力变化不利于某些国家时, 这些国家不太倾向于与其邻国缔结 RTA。Mark (2006) 研究认为, 美国在北美洲、德国在欧洲、巴西在南美洲的持续主导地位解释了北美自贸区、欧盟以及南美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民主制度的传播主要从政治制度相似性方面做出解释, 说明了美洲、欧洲等西方经济体的区域主义发展动因 (Mansfield et al., 2002)。“地缘政治稳定”假说认为, 降低军事冲突和获得安全收益是形成 RTA 的动机之一 (Martin et al., 2012)。此外, 少数文献探讨了双边政治关系对 RTA 的影响。孙楚仁等 (2022) 以全球多国样本为考察对象, 采用联合国投票行为数据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 RTA 承诺深度的负效应。

伴随着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日益推进, 少数文献专门考察了中国对外缔结 FTA 的动因。John & Yang (2009) 采用案例分析法, 将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形成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加强与对象国或地区的生产网络构建。二是改善与对象国的外交关系。三是与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区域组织开展谈判, 以保证原材料供应安全。四是接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某些工业化经济体的谈判邀请。Zeng (2016) 使用比例风险 (Cox) 模型对中国 FTA 形成时长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进行了比较分析, 其研究认为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主要基于政治动机, 经济动机往往退居其次。中国更有可能与具有相似政策偏好的国家开展 FTA 谈判, 而扩大市场准入机会或保障自然资源供应并不是决定中国 FTA 形成的主要因素。陈兆源 (2019) 探讨了中国 FTA 对象国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其研究发现, 相较于经济收益和国内政治因素, 外交战略等国际政治因素更有力地解释了中国 FTA 对象选择。

综上所述, 已有文献关于 RTA 签订或缔结动机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 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思路借鉴。从研究视角上看, 虽然个别文献从双边政治关系角度进行了分析, 但代理指标普遍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或“领导人互访次数”等反映两国短期政治关系的指标, 而从“外交伙伴关系”这种反映两国长期政治关系角度进行考察的文献还比较匮乏。基于此, 本文使用 2000~2021 年中国与 196 个伙伴国的面板数据, 重点探讨了外交伙伴关系在中国 FTA 签订

中发挥的作用。

相较于既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从研究角度上讲, 本文从外交伙伴关系视角探讨了影响中国 FTA 签订的国际政治动机, 进一步补充了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第二, 从研究对象上看, 大量文献重在解释欧洲、美洲等西方国家的区域主义发展浪潮, 实证研究数据也主要基于全球或西方经济体数据集。本文专门以中国签署的 FTA 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 进一步丰富了相关文献的研究范围。第三, 从研究深度上看, 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析影响 FTA 缔结概率的因素, 缺乏针对 FTA 异质性方面的研究。本文不仅分析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概率的影响, 还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议题覆盖范围、条款承诺深度、缔结数量等异质性方面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了相关文献的研究深度。此外, 结合中国实际, 本文还根据实证模型预测了中国 FTA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 为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外交伙伴关系与自由贸易协定 (FTA) 签订

关于双边政治关系与国际贸易或投资的研究, 涉及政治学、制度学和国际经济学等领域, 与本研究比较贴合的理论是新制度主义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杨连星等, 2016)。该理论的本质是引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来分析政治问题或解释政治现象, 包括采取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等, 并且将制度因素作为分析政治与经济现象的核心要素。

外交伙伴关系是两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综合判定和战略规划, 体现了两国相似的政治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是两国长期稳定友好政治关系的标志。当国与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时, 通常会签署联合声明。根据理性选择制度理论, 外交伙伴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两国间长期、实质性的正式制度安排 (杨连星等, 2016), 而自由贸易协定 (FTA) 是两国为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 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而签订的具有强约束力的区域性制度安排, 也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 (孙楚仁等, 2022)。基于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 外交伙伴关系这一正式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和政府决策的政治成本, 进而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 即外交伙伴关系对两国 FTA 签订具有正外部性。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从经济收益上看, 外交伙伴关系这一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策不确定性, 从而提高了双方企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 进而促进双方签订 FTA。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界定,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 包括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 (张中元, 2021)。其中,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代表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最高层次。一般而言,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层级越高, 则双方的合作领域越广, 合作层次也越深。但无论

何种层级的外交伙伴关系, 中国与伙伴国均达成了加强经贸领域合作的共识和特定承诺, 包括明确经贸合作意愿、建立经贸合作机制、给予关税优惠的单边措施以及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等。外交伙伴关系项下有关经贸领域合作的制度性建设框架, 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中国对外开放经济的积极信号 (陈兆源, 2019), 从而为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一般而言, 当两国政治关系友好时, 双方政府采取诸如出口管制、限制进出口、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贸易保护政策的倾向也越低, 也会较少采取诸如冻结资产、限制金融交易、阻断双边或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以及没收资产等金融制裁, 这无疑降低了双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 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主体的贸易和投资信心, 改善其对未来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 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主体面临的跨国交易风险以及交易成本, 产生更大的规模经济和福利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通过缔结 FTA 的方式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第二, 从政治成本上讲, 外交伙伴关系从制度上推进了两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从而降低了 FTA 谈判以及国内核准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压力, 进而促成中国与伙伴国签署 FTA。

FTA 是两国政府为实现对外经济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项贸易政策, 属于国家层面的决策, 这就要求两国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的国家, 通常会建立多种层级的对话和磋商机制, 包括两国领导人或元首的经常性对话、经贸合作和磋商机制等。其中, 两国领导人的经常性对话可以缓和或化解两国可能存在的认知分歧和争端, 及时增信释疑, 消除信任赤字和提高政治互信力, 进而提高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战略协同。而专门的经贸合作和磋商机制畅通了 FTA 谈判的沟通 and 交流渠道, 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协同提供了制度保证。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度的提高, 一方面使得双方在进行 FTA 谈判时具有较多的利益汇合点, 降低了双方在 FTA 议题设定、条款承诺、争端解决等方面存在的分歧, 从而缓解双方在 FTA 谈判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压力, 并通过缩短谈判时间提高了 FTA 谈判效率, 进而促进双方尽快达成 FTA。同时, 对外签订 FTA 也需要通过各自的国内核准程序。如果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对此项 FTA 的否决点越多、利益偏好差异性越大, 则政府批准该项 FTA 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多 (张玉环、李巍, 2014)。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度高的国家, 两国的民意基础也相对较好, 国内利益集团对 FTA 不满意甚至进行阻挠的否决点也就越少, 则政府批准该项 FTA 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低, 此时, 一国政府就越倾向于加入 FTA。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具有促进效应, 即中国更有可能与具有高层级伙伴关系的国家签订 FTA。

假说 2: 外交伙伴关系主要通过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FTA。

(二) 外交伙伴关系与 FTA 条款承诺异质性

根据议题覆盖范围和条款承诺深度, 中国对外缔结的 FTA 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从议题覆盖范围上看, 中国签署的 FTA 基本涵盖货物、服务和投资等传统议题, 但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府采购、劳工与环境等边境内规则和新兴议题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条款承诺深度上看, 中国与不同对象国签订的 FTA 在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以及边境内规则等承诺深度方面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从理论上讲,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越亲密, 或者说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 则对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和质量要求越高。而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深度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缔结全面、高质量的 FTA, 或者开展已有 FTA 的升级谈判, 进而提高 FTA 议题覆盖度和承诺深度。比如, 在中国 - 智利《战略伙伴关系》中, 双方承诺积极探讨 FTA 升级的可能性。而在此后更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 双方宣布启动 FTA 升级谈判。中国 - 智利升级议定书不仅提高了货物贸易开放水平, 扩大和提升了服务贸易开放部门的数量和水平, 还对原产地规则、经济技术合作章节进行修订和补充, 并新增电子商务、竞争、环境与贸易等规则议题。在中国 - 新西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 - 韩国《进一步充实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国 - 秘鲁《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 中国与伙伴国均表达了推进双边 FTA 升级谈判的要求。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层级越高, 越能提高 FTA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

三、计量模型设定、指标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借鉴 Baier et al. (2014)、铁瑛和蒙英华 (2020) 的概率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来评估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概率的影响, 并采用二值选择 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r(FTA_{it} = 1) = \Phi(\beta_0 + \beta_1 Drelation_{it} + X\beta + \delta_t) \quad (1)$$

其中, 下标 i 表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t 表示年份。 FTA_{it} 是被解释变量, 表示中国与 i 国是否签署了 FTA, 当取值为 1 时表示中国与 i 国在 t 年份签署了 FTA, 当取值为 0 时代表中国与 i 国在 t 年份未缔结 FTA。 $\Phi(\cdot)$ 是累积概率函数。中国与 i 国的外交伙伴关系 ($Drelation$)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主要以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伙伴关系层级来度量。 X 代表控制变量, 包括影响 FTA 签订的政治和经济变量。其中, 政治变量包括建交时长、国家治理质量。参考 Baier & Bergstrand (2004)、Baier et al. (2014), 本文的经济变量包括经济总规模、经济规模相似性、要素禀赋差异、第三方效应、地理距离、是否属于同一大陆。 δ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中国签订的 FTA, 不仅存在数量上的差异, 还在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率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FTA 的二值变量设定并不能捕捉到 FTA 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 基于

此, 本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进一步探究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异质性方面的影响。基于基准的 Logit 模型设定, 考察 FTA 异质性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FTA_{it}^{Heterogeneity} = \beta_0 + \beta_1 Drelation_{it} + X\beta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FTA_{it}^{Heterogeneity}$ 衡量了 FTA 在签订数量和承诺条款方面的异质性。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基准的 Logit 模型设定一致。 δ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FTA 相关变量。

(1) FTA 虚拟变量设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列示的 196 个伙伴国家为样本观测值, 将与中国签署双边或诸边 FTA 赋值到双边国家层面, 即如果某一国家与中国在某一年份缔结了双边或诸边 FTA, 则该国在签署当年及以后年份均设定为 1, 其他情况均为 0, 样本区间为 2000~2021 年。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与某一国家存在签署多项 FTA 的情况, 本文以最早签署 FTA 的年份进行赋值。在本样本区间内, 中国共签署了 16 项 FTA^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自贸区服务网^③。

(2) FTA 签订数量。除了是否签订 FTA 外, 中国与多个国家缔结了不止一项 FTA。比如, 中国与东盟在 2004 年签署了 FTA, 并于 2020 年与包含东盟 10 国在内的 15 个经济体签署了诸边协定 RCEP, 还与东盟某一成员国单独签署了双边 FTA (如, 中国 - 新加坡、中国 - 柬埔寨)。为评估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缔结数量的异质性效应, 本文构建了 FTA 签订数量指标, 即在虚拟变量设定基础上, 如果中国与某一国家在某一年份签署了第二项 FTA, 则签署当年及以后年份均加 1, 依此类推。

(3) FTA 承诺异质性。FTA 虚拟变量设定和签订数量指标均将 FTA 视为同质的, 即不考虑各个 FTA 在条款承诺方面存在的异质性。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构建了 FTA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指标, 以捕捉外交伙伴关系对 FTA 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

在条款承诺深度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主要参考 Hofmann et al. (2017) 发布的“协定深度”数据库^④。该数据库对 1858~2015 年间生效的 279 个 RTA (包括 FTA) 文本进行解读, 将贸易协定的“深层条款”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WTO +”, 即在 WTO 谈判范围内但提高了条款承诺水平, 共包括 14 类条款。二类是“WTO - X”, 即超出了 WTO 承诺范围, 共包括 38 类条款。该数据库对每个 RTA 项下 52 类条款中的承诺情况进行一一赋值, 如果 RTA 未包含该类条款, 赋值为 0。如果 RTA 包含该类条款但不具有法律执行力, 则赋值为 1。如果 RTA 包含某类且具有法律执行力, 则赋值为 2。由于该数据库未包含 2016 年以来中国签署的 FTA, 因此, 本文参考指标赋值方法对中国在 2015 年后签署的中国 - 柬埔寨、中国 - 毛里求斯、RCEP 等 FTA 进行条款赋值。此外, 该数据库也未对中国 - 东盟、中国 - 巴基斯坦、中国 - 新加坡、中国 - 智利、中国 - 新西兰升级协定进行深度条款赋值。考虑到这些升级协定在条款承诺方面的进一步深化, 本文也对已有协定的升级版本做了补充测算, 以捕捉这些协定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基于每项条款的赋值得分, 本文取所有 52 项条款的总得分来衡量 FTA 协定深度。

在条款覆盖度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主要基于 DESTA (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数据库^⑤。DESTA 数据库对 2016 年以前生效的 600 多项 RTA 进行条款深度指标构建, 主要将 RTA 中的 7 项特定条款进行 0、1 赋值, 具体包括是否属于全面 RTA、是否包含货物标准评定程序、是否包含投资条款、是否包含服务条款、是否包含政策采购条款、是否包含竞争条款、是否包含知识产权条款。此外, 该数据库未对 2016 年以来中国签署的 FTA 进行深度测量, 因此, 本文参考此赋值方法进行补充测算。基于每项条款赋值得分, 本文加总这 7 项特定条款的得分来度量 FTA 条款覆盖度。

2. 核心解释变量: 外交伙伴关系。

本文主要以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对 196 个伙伴国的“双边关系”中对政治关系的描述以及“文件”中有关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来度量外交伙伴关系。在双边关系和文件声明描述中,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伙伴关系大致会经历友好合作或战略合作、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层层递进关系。参考张中元 (2021), 本文将外交伙伴关系划分为友好合作、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五个层级。在这五个层级中, 外交伙伴关系等级依次增强。本文对这五个层级外交伙伴关系的赋值规则如下: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或者未建立友好合作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0。建立友好合作或战略合作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1。建立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2。建立全面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3。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4。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5^⑥。外交伙伴关系变量是一个排序变量, 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0~2021 年。

3. 控制变量。

(1) 政治相关变量。

本文的政治因素变量包括建交时长、国家治理质量。其中, 建交时长反映了中国与伙伴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持续时间。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建交年份为基础, 进而计算出中国与伙伴国在样本区间内 (2000~2021 年) 的外交时长; 国家治理质量主要衡量了伙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一般而言, 当一国政府治理水平越高时, 越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 双方缔结 FTA 的可能性越大 (Mansfield et al., 2002)。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WGI) 数据库从法治程度、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发言权和问责六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治理质量, 本文取上述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2) 经济相关变量。

参考 Baier & Bergstrand (2004, 2014)、Egger & Larch (2008), 本文的经济因素变量包括双边经济总规模、经济规模相似性、要素禀赋差异、第三方效应、地理距离、是否属于同一大陆。经济总规模、经济规模相似性属于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两国经济规模越大、越相似, 则贸易创造效应和福利收

益越明显, 两国更有可能签署 FTA。本文使用双边 GDP 之和来衡量经济总规模。对于经济规模相似性, 参考 Egger & Larch (2008), 本文使用如下公式来衡量: 经济规模相似性 = $1 - [GDP_i / (GDP_i + GDP_c)]^2 - [GDP_c / (GDP_i + GDP_c)]^2$ 。其中, GDP_i 表示伙伴国 GDP, GDP_c 表示中国 GDP。该指标取值范围为 0-0.5, 数值越大, 表示伙伴国与中国的经济规模越相似。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要素禀赋差异属于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的产业间贸易决定因素。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越大, 则两国会更加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贸易创造和福利收益也越大, 此时两国更有可能签署 FTA。参考 Baier & Bergstrand (2004), 本文使用资本劳动比 (K/L) 之差绝对值来度量双边要素禀赋差异。其中, 关于资本 (K) 的衡量, 参考程中海、张伟俊 (2017) 的估算方法, 本文以 1995 年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将每年的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7%。具体计算公式为: $K_t = 0.93K_{t-1} + I_t$, 其中 I 代表当年形成的固定资本总值。关于劳动力 (L) 的衡量, 本文使用 15 岁及以上可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动人口来衡量。固定资本总值 (I) 和劳动力 (L) 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对于第三方效应, 借鉴 Chen & Joshi (2010)、Baier et al. (2014), 本文统计了中国与伙伴国以外的第三国签署的 FTA 数量之和、伙伴国与中国之外的第三国签署的 FTA 数量之和, 并用这两项数量之和来测度“第三方效应”。各国签署 FTA 情况来源于 WTO 区域贸易协定信息通报系统 (RTA-IS)^⑦。地理距离、是否为同一大陆属于影响两国缔结 FTA 的天然地理因素。其中, 地理距离为双边首都之间的球面距离,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为虚拟变量, 相关数据来自 CEPII 数据库^⑧。

(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 FTA	3127	0.11	0.32	0	1
FTA 签订数量	3127	0.13	0.40	0	3
FTA 条款承诺深度	3127	2.08	7.44	0	47
FTA 条款覆盖度	3127	0.38	1.22	0	7
解释变量					
外交伙伴关系	3127	1.52	1.96	0	5
建交时长	3127	36.56	16.99	-18	72
国家治理质量	3127	49.48	26.42	2.10	99.76
经济总规模(取对数)	3127	29.46	0.81	27.89	31.34
经济规模相似性	3127	0.06	0.11	0	0.50
要素禀赋差异(取对数)	3127	9.75	1.52	2.43	12.83
第三方效应	3127	0.43	0.83	0	5
地理距离(取对数)	3127	8.98	0.50	6.86	9.87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	3127	0.25	0.43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是基于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其中, 列 (1) 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 (2) 为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对比列 (1) 和列 (2) 结果发现, 引入控制变量后 logit 回归的准 R^2 得到显著提高, 说明加入控制变量是必要的。列 (2) 基准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0.5805,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 (3) 几率比 (OR 值) 为 1.7870, 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每增加一个级别, 中国与伙伴国缔结 FTA 的几率比会提升 78.70%。该项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说 1, 即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中国更有可能与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的国家缔结 FTA。一方面, 外交伙伴关系为中国与伙伴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共识和承诺提供

表 2: 基于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 FTA	(1)	(2)	(3)
	logit	logit	几率比 (OR 值)
外交伙伴关系	0.6126 *** (0.0344)	0.5805 *** (0.0537)	1.7870 *** (0.0959)
建交时长		0.0321 *** (0.0061)	1.0326 *** (0.0063)
国家治理质量		0.0476 *** (0.0051)	1.0488 *** (0.0053)
经济总规模		-2.9327 *** (0.4844)	0.0533 *** (0.0258)
经济规模相似性		3.1353 *** (0.5162)	22.9952 *** (11.8697)
要素禀赋差异		-0.2973 *** (0.0717)	0.7428 *** (0.0532)
第三方效应		-0.1239 (0.1002)	0.8835 (0.0885)
地理距离		-0.3581 (0.2375)	0.6990 (0.1660)
是否同一大陆		3.2828 *** (0.2648)	26.6492 *** (7.0555)
常数项	-3.8548 *** (0.4840)	85.6246 *** (14.4787)	1.54e + 37 *** (2.22e + 3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27	3127	3127
准 R^2	0.1900	0.4472	0.4472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了体制性合作框架, 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提高了经济合作的预期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FTA。另一方面, 外交伙伴关系提高了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有助于减少双方在 FTA 条款承诺方面存在的分歧, 提高 FTA 谈判效率, 并降低 FTA 国内核准程序的成本, 进而促进双方签署 FTA。

列 (2) 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其他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中国 FTA 签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 从政治因素上看, 双方建交时长、政府治理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伙伴国缔结 FTA 的概率, 符合理论预期。从经济因素上看, 经济总规模与中国 FTA 签订显著负相关, 经济规模相似性与中国 FTA 签订显著正相关, 要素禀赋差异与中国 FTA 签订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中国更倾向于与经济规模小或者经济规模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伙伴国缔结 FTA, 而伙伴国经济规模越大、要素禀赋差异越大, 越不利于中国 FTA 签订。虽然该项实证结果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区域性贸易协定 (RTA) 缔结概率的文献存在不同 (Baier & Bergstrand, 2004; Baier et al., 2014), 但却与研究中国 FTA 缔结因素的文献高度一致。陈兆源 (2019) 研究认为, 中国往往会选择那些双边关系良好、经济规模较小的伙伴国, 这样有利于运用自身的市场权力, 而不至于过度冲击国内市场和经济体制。“第三方效应”可能是促进全球 RTA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但在中国 FTA 形成中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在经济地理方面, 中国更倾向于与亚洲大陆经济体缔结 FTA, 这反映了中国构建以周边为核心的 FTA 战略。此外, 地理距离对中国 FTA 签订没有显著影响。

为考察模型拟合度以及外交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本文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评估。一是比较两个模型的信息准则。二是计算模型的“正确预测的百分比”。在信息准则方面, 常用的模型选择方法是比较 AIC (赤池信息准则) 和 BIC (贝叶斯信息准则) 的差值, AIC 和 BIC 下降得越多, 意味着模型拟合得越精确。表 3 是基于信息准则的模型拟合度计算结果。对比发现,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变量时, AIC 和 BIC 的值分别下降了 113、108。根据相关文献界定的标准, 外交伙伴关系对于模型拟合度提高具有“非常强烈”的影响^⑨。

表 3: 基于信息准则的模型拟合度

	AIC	BIC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模型拟合度	1077	1258
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模型拟合度	1190	1366

在概率模型预测方面, Baldwin & Jaimovich (2012) 研究认为, 被解释变量从非 FTA 状态到 FTA 状态的转换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意味着使用传统的 0.5 作为“正确分类比率”的临界值有失偏颇。基于此,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作为“正确分类比率”的临界值。在本样本中, 被解释变量“是否缔结 FTA”的样本均值为 0.11, 也就是说如果预测的 FTA 概率值大于 0.11, 则认为其预测 FTA = 1, 反之, 则认为其预测 FTA = 0。从表 4 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在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变量时,

该模型成功地预测了 83.80% 的中国 FTA 签订。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后, 模型成功预测的概率提高到 89.55%, 预测能力提高了 5.75 个百分点, 整体预测准确率为 88.05%, 总体拟合情况良好。

表 4: 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 FTA 预测情况

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预测情况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预测情况		
预测值	真实值		预测值	真实值	
	FTA _{it} = 1	FTA _{it} = 0		FTA _{it} = 1	FTA _{it} = 0
FTA _{it} = 1	83.80%	16.20%	FTA _{it} = 1	89.55%	10.45%
FTA _{it} = 0	16.03%	83.97%	FTA _{it} = 0	13.76%	86.24%
总体预测准确率	83.95%		总体预测准确率	88.05%	

(二) 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主要采用更换计量方法、替换核心变量、排除其他区域经济合作事件的冲击等方面进行检验。表 5 是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 列 (1)、(2)、(3) 分别是采用二值选择 Probit 模型、调整 Logit、零膨胀泊松模型 (Zip) 的估计结果, 列 (4) 是将 FTA 生效时间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 (5) 是考虑外交伙伴关系滞后效应的估计结果, 列 (6) 是参考张中元 (2021) 对外交伙伴关系进行四个层级赋值后的回归结果, 列 (7)、(8) 分别是剔除《亚太优惠贸易协定》样本、引入是否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上看, 无论是更换实证回归方面、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还是考虑到其他区域经济合作事件的影响,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的影响均为正, 且均在 1% 水平显著, 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 FTA	(1)	(2)	(3)	(4)	(5)	(6)	(7)	(8)
	probit	调整 logit	Zip	logit	logit	logit	logit	logit
外交伙伴关系	0.2773 *** (0.0300)	0.6300 *** (0.0587)	0.3616 *** (0.0389)	0.6010 *** (0.0670)			0.8629 *** (0.0776)	0.5671 *** (0.0619)
外交伙伴关系 滞后两期					0.5746 *** (0.0626)			
外交伙伴关系 (四个层级)						0.7121 *** (0.0713)		
常数项	79.0296*** (10.7331)	-28.2408*** (3.8441)	48.7592*** (9.5891)	151.8323*** (23.3818)	142.9943*** (20.1508)	133.3046*** (20.1942)	166.7505*** (29.1498)	143.2888*** (21.70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27	3127	3127	2987	2987	3127	2636	3127
准 R ²	0.5371	---	---	0.5471	0.5467	0.5478	0.4448	0.5435

注: 限于篇幅, 未报告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下表同。

(三) 内生性讨论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FTA 签订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误, 即模型中可能遗漏了影响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FTA 的一些特定变量, 而这些变量恰好决定了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FTA 的谈判效率或者进程。二是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即外交伙伴关系不仅能影响中国 FTA 签订, FTA 签订也可能对外交伙伴关系产生影响。中国与伙伴国签署 FTA, 有利于提高双方的经济与贸易联系, 进而通过形成共同经济利益促进外交伙伴关系的改善。

针对第一种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其解决办法是把可能与外交伙伴关系相关的变量均加以控制, 或者控制能够反映所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家特征, 比如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等 (杨连星等, 2016)。基于此,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考虑了军事冲突次数、是否有共同语言、宗教相似度^⑩。针对第二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只考虑未签署 FTA 及 FTA 签署当年的观测值, 不考虑 FTA 签署之后的样本观察值,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排除 FTA 签署之后对外交伙伴关系的影响。二是使用工具变量法 (IV), 即寻找一个与外交伙伴关系高度相关但不直接影响中国 FTA 签订的变量。本文参考王珏等 (2019)、孙楚仁等 (2022), 采用“中国与其他伙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外) 的外交伙伴关系均值”作为双边外交伙伴关系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 中国与其他伙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外) 的外交伙伴关系均值代表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倾向, 与

表 6: 考虑内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 是否缔结 FTA	(1)	(2)	(3)	(4)
	遗漏变量偏误	反向因果偏误		
	logit	logit	ivprobit	ivprobit
外交伙伴关系	0.6343 *** (0.0864)	0.3758 ** (0.1780)	0.6654 *** (0.0494)	0.3512 *** (0.0288)
军事冲突次数	-0.4636 (0.4676)			
是否有共同语言	0.2106 (0.4310)			
宗教相似度	-86.7492 *** (14.2272)			
常数项	97.3898 *** (19.1259)	47.8192 * (25.1069)	29.7628 *** (6.8386)	49.8956 *** (10.5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F 值	---	---	68.12	523.02
观测值	2011	1601	3127	2987
准 R ²	0.5371	0.3273	---	---

中国与特定伙伴国的双边外交伙伴关系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而中国与其他伙伴国(除特定伙伴国外)的外交伙伴关系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与特定伙伴国签订 FTA 的决定。除了寻找外部工具变量外, 借鉴杨连星等(2016), 本文使用外交伙伴关系的滞后二期作为内部工具变量。

表 6 是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估计结果。列(1)是针对遗漏变量偏误的估计结果, 在考虑军事冲突次数、是否有共同语言、宗教相似度等可能遗漏的变量基础上,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列(2)~(4)是针对反向因果关系引致偏误的估计结果, 其中, 列(2)是只考虑缔结 FTA 之前及当年的观测值的 Logit 估计结果, 列(3)是使用中国与其他伙伴国(除特定伙伴国)的外交伙伴关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两步法估计结果, 列(4)是使用外交伙伴关系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两步法估计结果。从实证结果上看, 无论是删除可能导致反向因果识别的观测值, 还是采用工具变量法,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缔结概率的影响仍然显著, 且与基准估计结果类似,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

(四) 机制检验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即主要通过观测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分析(江艇, 2022)。其中, M 代表中介变量, 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

$$M_{it} = \beta_0 + \beta_1 Drelation_{it} + X\beta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首先, 外交伙伴关系通过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经营主体的贸易和投资信心, 并改善其对未来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通过缔结 FTA 的方式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期的歧视性贸易和金融限制措施方面, 因此, 本文主要通过观察双边贸易和金融摩擦数据, 来近似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选取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相互实施的贸易和金融措施频次的均值来测度, 数据来自全球摩擦预警数据库(Global Trade Alert, GTA)。该指标越大, 意味着中国与伙伴国之间采取的贸易和金融措施的数量越多或者频次越高, 则双方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大。表 7 列(1)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显著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伙伴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其次, 外交伙伴关系通过提高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进一步减少了双方在 FTA 承诺条款方面存在的分歧, 并降低了 FTA 国内核准程序的成本, 进而促进双方签署 FTA。在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度量方面, 本文使用联合国投票中的“理性点距离”(ideal point)和“投票相似度”指标, 数据来自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①。其中, 中国与伙伴国的“理想点距离”越大, 说明双方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差异越大, 则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程度也越低。中国与伙伴国的“投票相似度”越高, 说明双方对某一国际事务的立场趋于相似, 则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程度也越高。表 7 列(2)、(3)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显著

表 7: 影响机制分析

	(1)	(2)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理想点距离	投票相似度
外交伙伴关系	-1.4329 ** (0.6186)	-0.0135 *** (0.0039)	0.0010 * (0.0005)
常数项	1.5e+03 (3.3e+03)	53.9532 * (31.5193)	11.5204 *** (2.89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21	3127	3127
R ²	0.8676	0.9139	0.9131

降低了中国与伙伴国在联合国投票中的“理想点距离”，并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伙伴国的投票相似度，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伙伴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信任。假说 2 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FTA 异质性

本文主要探究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概率的影响，其中隐含的假设是中国与所有对象国签署的 FTA 是同量同质的，并未考虑 FTA 缔结数量、承诺条款差异等方面存在的异质性。考虑到此，本文基于计量模型 (2)，通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 (LSDV)，进一步考察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数量、条款承诺深度、条款覆盖度等 FTA 异质性方面的影响。

表 8 列 (1) 估计结果显示，外交伙伴关系与 FTA 签订数量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中国与对象国在 FTA 项下的合作次数也就越多，包括签署一对一的双边 FTA 以及由多个国家参与的诸边贸易协定等。列 (2)、(3) 估计结果显示，外交伙伴关系与条款承诺深度、条款覆盖度均显著正相关，意味着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层级越高，越能提高 FTA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其背后的逻辑

表 8: 外交伙伴关系与 FTA 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FTA 异质性	(1)	(2)	(3)
	签订数量	条款承诺深度	条款覆盖度
外交伙伴关系	0.0459 *** (0.0042)	0.7403 *** (0.0899)	0.1345 *** (0.0143)
常数项	4.0267 *** (0.6168)	59.0202 *** (11.5239)	10.2301 *** (1.85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27	3127	3127
R ²	0.3041	0.1767	0.2123

是: 伴随着中国与伙伴国外交伙伴关系的递进, 其对自贸协定合作的内容和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促使双方开展 FTA 升级谈判或者直接进行高水平的 FTA 谈判。无论是开展 FTA 升级谈判, 还是直接缔结高水平的 FTA, 均加大了双方在货物、服务、投资等传统领域的承诺开放度和市场准入范围, 同时还会对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与贸易、中小企业等新兴议题和边境内规则进行承诺, 这无疑提高了 FTA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假说 3 得到验证。

六、拓展性分析: 中国 FTA 对象国预测

在 FTA 对象国预测方面, 本文参考 Baldwin & Jaimovich (2012), 以“是否缔结 FTA”的样本均值作为“正确分类比率”的临界值来进行预测。表 9 是模型预测结果。

首先, 在已签署的对象国中, 除了马尔代夫、缅甸、日本未预测到外, 其他与中国签署 FTA 的国家均已预测到。中国 - 马尔代夫、中国 - 缅甸自贸协定未预测到的原因是: 这两个国家的相关控制变量存在缺失, 导致其未能参与样本估计, 进而不能对其进行概率预测。除马尔代夫、缅甸之外, 在实际参与回归的样本中, 只有日本未预测到, 这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是很高的。迄今为止, 中国与日本并未签署双边 FTA, 但在 2020 年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 14 个经济体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 属于一项诸边贸易协定, 除日本外, 中国与韩国、东盟 10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其他参与方均缔结了双边 FTA。

其次, 在 FTA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上, 本文预测了那些与中国签署 FTA 概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涵盖到全球六大洲的诸多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中国应重点与这些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开展 FTA 谈判, 以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 在亚洲地区, 中国可与蒙古、印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以色列、约旦、东帝汶、孟加拉国、亚美尼亚等缔结双边 FTA, 在区域性组织方面, 中国可与包括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缔结 FTA, 与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开展 FTA 谈判。在大洋洲地区, 中国可与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瓦努阿图开展 FTA 谈判。在北美地区, 中国可选择与加拿大缔结双边 FTA, 与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加勒比共同体开展 FTA 谈判。在南美地区, 中国可优先考虑与阿根廷、巴西、苏里南、乌拉圭开展 FTA 谈判。在欧洲地区, 中国可与荷兰、法国、德国等欧盟经济体以及英国和俄罗斯等加强贸易方面的合作。在非洲地区, 中国可选择与南非、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塞拉利昂等开展 FTA 谈判。

再次, 在中国建交的 196 个伙伴国中, 由于部分经济体的控制变量存在缺失, 导致 40 个经济体未参与样本估计, 故不能对其进行概率预测。其中, 亚洲地区包括叙利亚、不丹、巴勒斯坦、朝鲜、也门、马尔代夫、缅甸。大洋洲地区包括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库克群岛、纽埃、图瓦卢、帕劳。北美

表 9: 模型预测的中国 FTA 对象国

所在州	已经与中国签署 FTA 的国家	尚未与中国签署 FTA 的国家
亚洲	巴基斯坦、韩国、东盟经济体 (不含缅甸)、格鲁吉亚	蒙古、印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色列、约旦、东帝汶、孟加拉国、亚美尼亚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瓦努阿图
北美	哥斯达黎加	加拿大、牙买加
南美	智利、秘鲁	阿根廷、巴西、苏里南、乌拉圭
欧洲	瑞士、冰岛	欧盟经济体: 荷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保加利亚、波兰、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塞尔维亚、英国、俄罗斯
非洲	毛里求斯	塞内加尔、南非、纳米比亚、塞拉利昂

洲地区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地、洪都拉斯、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圣基茨与尼维斯、危地马拉。南美洲地区包括巴拉圭、哥伦比亚。欧洲地区包括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列支敦士登。非洲地区包括斯威士兰、利比里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外交伙伴关系这一国际政治因素视角,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 本文使用 2000~2021 年面板数据, 采用二值选择 Logit 模型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概率, 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同时, 本文以“是否缔结 FTA”的样本均值作为“正确分类比率”的临界值, 对中国 FTA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预测。本研究发现: 第一,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FTA 签订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中国更有可能与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的国家缔结 FTA。第二,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外交伙伴关系主要通过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进而推进中国 FTA 签订。第三,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FTA 签订数量、条款承诺深度以及条款覆盖度均显著正相关。第四,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中国 FTA 对象国涵盖全球诸多经济体或者区域性组织。其中, 亚洲地区的 FTA 对象国最多, 其次是欧洲、美洲地区, 最后是大洋洲、非洲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 鉴于外交伙伴关系在 FTA 签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各国发展外交伙伴关系时, 一方面要注重战略合作和磋商机制的构建, 进一步提高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另一方面应坚持亲疏分明原则, 实施差异化的外交战略。中国可在各个区域建立“战略支点”, 通过发挥支点国家的示范和辐射效应, 带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进而深化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

第二, 在 FTA 签订方面, 中国需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 FTA 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看, 建议参考本文的预测结果, 逐步扩大与南亚和中亚、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非洲等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可行性研究。从深度上看, 中国要抓紧开展对已有 FTA 的升级谈判。同时, 中国要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DEPA) 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 积极参与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反腐败、监管一致性等边境内规则以及新兴议题的谈判。

第三, 中国要注重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进而更好地发挥外交伙伴关系在中国 FTA 签订中的正向溢出效应。中国首先要加强对经济政策的长远性、战略性调控, 尽量减少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经贸政策方面的调整频次。其次, 中国要密切关注伙伴国的经济政策变动情况, 可通过自媒体、公众号、互联网等数字传递方式提供重要国际市场的经贸政策信息。再次, 中国要注重推进与 FTA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 不断提升中国的营商环境, 以吸引更多的伙伴国与中国缔结 FTA。

(通讯作者 冯祯祯电子邮箱: fengzhenzhenfz@163.com)

注释:

- 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定义, 区域贸易协定(RTA)包括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政治经济一体化。目前, FTA 属于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形式。对于中国而言, 除了《亚太优惠贸易协定》外, 中国对外缔结的 RTA 均属于 FTA。
- ② 具体包括中国 - 东盟、中国 - 澳大利亚、中国 - 智利、中国 - 哥斯达黎加、中国 - 格鲁吉亚、中国 - 韩国、中国 - 新西兰、中国 - 新加坡、中国 - 冰岛、中国 - 巴基斯坦、中国 - 秘鲁、中国 - 瑞士、中国 - 毛里求斯、中国 - 马尔代夫、中国 - 柬埔寨、RCEP。
- ③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 ④ 数据网址为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dta/index.html/>。
- ⑤ 数据网址为 <https://www.designoftradeagreements.org/downloads/>。
- ⑥ 在合作伙伴等级中, 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互信伙伴”“睦邻伙伴”“发展伙伴”“友好合作伙伴”“紧密的伙伴关系”等。在全面合作伙伴等级中, 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全面伙伴”“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在战略合作伙伴等级中, 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战略伙伴”“战略协作伙伴”。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级中, 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全方位战略伙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 ⑦ 数据网址为 <http://rtais.wto.org>。
- ⑧ 数据网址为 http://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_modele.asp。
- ⑨ 根据 Raftery (1995) 界定的 BIC 差异标准: 若 BIC 下降 0~2, 则模型改善的程度较弱, 若下降 2~4, 则模型改善的程度较强, 依次类推。BIC 下降得越多表明变量的重要性越强。例如, Baldwin & Jaimovich (2012) 在引入核心解释变量时, AIC、BIC 分别下降了 59.56、50.04。
- ⑩ 军事冲突次数是某一年份中国与伙伴国的军事冲突次数, 数据来源于国际军事争端数据库 (MID5.0), 网址为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是否有共同语言、宗教相似度来自于 CEPII 数据库。其中宗教相似度取值在 0 到 1 之间, 取值越大, 表明两国的宗教相似程度越大。
- ⑪ 数据网址为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Voeten>。

参考文献:

- 陈兆源, 2019.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选择——基于外交战略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7):131-160.
- 程中海, 张伟俊, 2017.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J]. 世界经济研究(10):78-92 + 136-137.
- 江艇, 2022.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5):100-120.
- 孙楚仁, 2022.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为何会降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J]. 国际贸易问题(11):104-122.
- 铁瑛, 黄建忠, 徐美娜, 2021. 三方效应、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中国策略: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J]. 经济研究(1):155-170.
- 铁瑛, 蒙英华, 2020. 移民、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协定[J]. 经济研究(2):165-180.
- 王珏, 李昂, 周茂, 2019.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J]. 当代财经(1):96-107.
- 王孝松, 常远, 2022. 双边关系与贸易保护——来自中国遭遇贸易壁垒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与政治(2):32-59 + 156-157.
- 杨连星, 刘晓光, 张杰, 2016.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11):56-72.
- 张玉环, 李巍, 2014. 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J]. 国际政治研究(2):19.
- 张中元, 20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12):24-53.
-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2004.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4(1):29-63.
-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2014. Mariuto R.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 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2(1):31-58.
- Baldwin R, 2008. 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J].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3(3):449-478.
- Baldwin R E, Jaimovich D, 2012. Are Free Trade Agreements Contagiou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8(1):1-16.
- Bhagwati J, 2008. 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M X, Joshi S, 2010. Third-country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2(2):238-248.
- Egger P, Larch M, 2008. Interdependent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Membership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6(2):384-399.
- Grossman G M, Helpman E, 1995.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4):667-690.
- Hofmann C, Alberto O, Michele R, 2017. Horizontal Depth: A New Database on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R]. World Bank Grou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981.
- John R, Yang J, 2009. China's Move to Preferential Trading: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8(18):27-46.
- Krugman P, 1993.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Analytical Notes. In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 D, Milner H V, Rosendorff B P, 2002.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3):477-513.
- Mansfield E D, Reinhardt E, 2003. 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 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4):829-862.

- Mark M,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rimination: Modelling the Spread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J].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cGill University.
- Martin P, Mayer T, Thoenig M, 2012. The Geography of Conflicts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4(4): 1-35.
- Raftery A E, 1995. Bayesian Model Selection in Social Research[J].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5(1): 111-63.
- Vicard V, 2012. Trade, Conflic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Explain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6(1): 54-71.
- Zeng K, 2016.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 Diplomacy[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3): 277-305.

Diplomatic Partnership and the Signing of China's FTA

MIAO Cuifen, FENG Zhenzhen

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enhance high-standard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ree trade areas for the world.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and 196 partner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1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 impact of diplomatic partnership on the signing of China's FTA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clause commitments. The sample mean of "whether to conclude an FTA" is adopted as the critical value for the "correct classification ratio" to predic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TA target coun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plomatic partnership,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China to sign FTA with partner countries and the greater the depth and coverage of clause commitments. The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China's FTA target countries include many economies o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Asia, Oceani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frica.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basis for China to carry out FTA negotiation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Key words: diplomatic partnership;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binary choice Logit model; FTA target countries

Recommended citation:

MIAO C F, FENG Z Z, 2024. Diplomatic Partnership and the Signing of China's FTA[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40(7): 37-55.

(责任编辑 春 晓)